



形上智慧如何可能

中国现代哲学的沉思

郁振华 · 著

形上智慧如何可能
——中国现代哲学的沉思

郁振华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形上智慧如何可能：中国现代哲学的沉思 / 郁振华
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6

(智慧的探索丛书)

ISBN 978 - 7 - 5495 - 6200 - 8

I. ①形… II. ①郁… III. ①哲学—研究—中国—现代 IV. ①B2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91171 号

出品人：刘广汉

责任编辑：肖莉

特约编辑：李春勇

装帧设计：徐妙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 - 31260822 - 882/883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印刷

(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寿济路 13188 号 邮政编码：256401)

开本：690mm × 960mm 1/16

印张：21 字数：310 千字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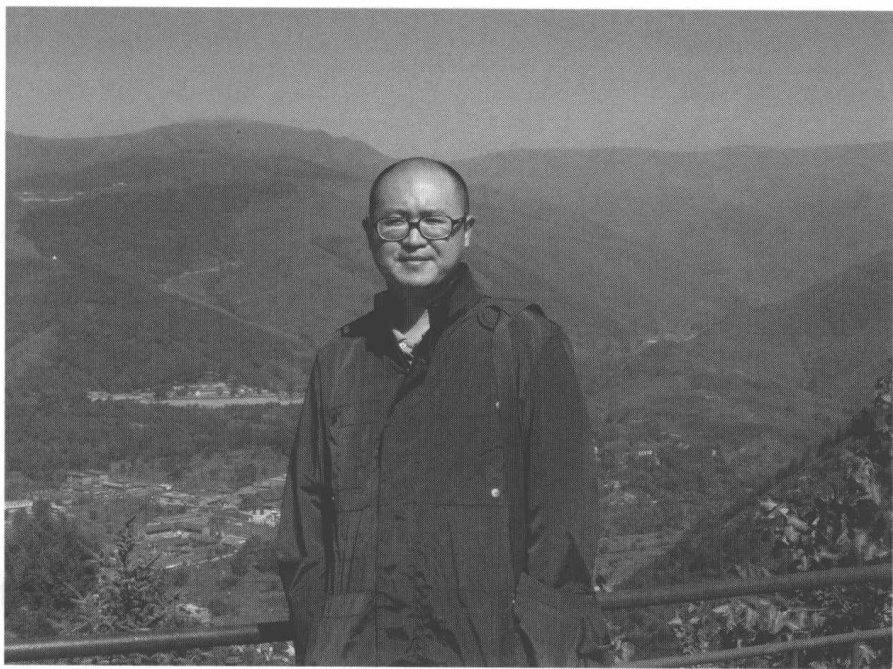
定价：6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单位联系调换。

“智慧的探索丛书”编委会

(以汉语拼音为序)

陈卫平 冯 棉 高瑞泉 刘广汉
童世骏 杨国荣 郁振华



作者简介

郁振华,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98年获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2006年获挪威卑尔根大学博士学位。曾在美国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法国里昂高师等从事访问研究。现任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主任,兼任第七届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国际形而上学学会(ISM)秘书长、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知识论分委员会副会长、上海中西哲学与文化比较研究会副会长、美国波兰尼学会理事、中法科学与社会联合研究院(Joriss)知识与行动研究室(KAL)中方主任。主要学术兴趣:认识论、形上学、中西哲学比较。代表作:《形上的智慧如何可能?》(2000)、《人类知识的默会维度》(2012),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和 *International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等刊物上发表中英文论文七十多篇,与人合译《跨越边界的哲学》(1999)、《西方哲学史》(2004)、《时代之思》(2007)。

总序

杨国荣

作为把握世界的观念形态,哲学的内在规定体现于智慧的追问或智慧之思。这不仅仅在于“哲学”(philosophy)在词源上与智慧相涉,而且在更实质的意义上缘于以下事实:正是通过智慧的追问或智慧之思,哲学与其他把握世界的形式区分开来。这一意义上的智慧——作为哲学实质内涵的智慧,首先相对于知识而言。如所周知,知识的特点主要是以分门别类的方式把握世界,其典型的形态即是科学。科学属分科之学,中文以“科学”(分科之学)作为“science”的译名,无疑也体现了科学(science)的特征。知识之“分科”,意味着以分门别类的方式把握世界:如果具体地考察科学的不同分支,就可以注意到,其共同的特点在于以不同的角度或特定的视域去考察世界的某一方面或领域。自然科学领域中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理学、地质学,等等,侧重于从特定的维度去理解、把握自然对象。社会科学领域中的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等,则主要把握社会领域中的相关事物。无论是自然科学,抑或社会科学,其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都界限分明。以上现象表明,在知识的层面,对世界的把握主要以区分、划界的方式展开。

然而,在知识从不同的角度对世界分而观之以前,世界首先以统一、整体的形态存在:具体、现实的世界本身是整体的、统一的存在。与这一基本的事实相联系,如欲真实地把握这一世界本身,便不能仅仅限于知识的形态、以彼此相分的方式去考察,而是同时需要跨越知识的界限,从整体、统一的层面加以理解。智慧不同于知识的基本之点,就在于以跨越界限的方式

去理解这一世界,其内在旨趣则在于走向具体、真实的存在。可以看到,这一意义上的“智慧”主要与分门别类的理解世界方式相对。

具体而言,智慧又展开为对世界的理解与对人自身的理解二重向度。关于世界的理解,可以从康德的思考中多少有所了解。康德在哲学上区分把握存在的不同形态,包括感性、知性、理性。他所说的理性有特定的含义,其研究的对象主要表现为理念。理念包括灵魂、世界、上帝,其中的“世界”,则被理解为现象的综合统一:在康德那里,现象的总体即构成了世界(world)。^①不难注意到,以“世界”为形式的理念,首先是在统一、整体的意义上使用的。对世界的这种理解,与感性和知性的层面上对现象的把握不同,在这一意义上,康德所说的理性,与“智慧”这种理解世界的方式处于同一序列,可以将其视为形上智慧。确实,从哲学的层面上去理解世界,侧重于把握世界的整体、统一形态,后者同时又展开为一个过程,通常所谓统一性原理、发展原理,同时便具体表现为在智慧层面上对世界的把握。

历史地看,尽管“哲学”以及与哲学实质内涵相关的“智慧”等概念在中国相对晚出,但这并不是说,在中国传统的思想中不存在以智慧的方式去把握世界的理论活动与理论形态。这里需要区分特定的概念与实质的思想,特定概念(如“哲学”以及与哲学实质内涵相关的“智慧”等)的晚出并不意味着实质层面的思想和观念也同时付诸阙如。

当然,智慧之思在中国哲学中有其独特的形式,后者具体表现为对“性与天道”的追问。中国古代没有运用“哲学”和“智慧”等概念,但却很早便展开了对“性与天道”的追问。从实质的层面看,“性与天道”的追问不同于器物或器技层面的探索,其特点在于以不囿于特定界域的方式把握世界。

“性与天道”的追问是就总体而言,分开来看,“天道”更多地与世界的普遍原理相联系,“性”在狭义上和人性相关,在广义上则关乎人的整个存在,“性与天道”,合起来便涉及宇宙人生的一般原理。这一意义上的“性与天道”,在实质层面上构成了智慧之思的对象。智慧之思所指向的是宇宙人生的一般原理,关于“性与天道”的追问,同样以宇宙人生的一般原理为其实质内容。

^① 参见 Kant,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Translated by N. K. Smith, Bedford/St. Martin's Boston, New York, 1965, p. 323.

从先秦开始,中国的哲学家已开始对“道”和“技”加以区分,庄子即提出了“技”进于“道”的思想,其中的“技”涉及经验性的知识,“道”则超越于以上层面。与“道”“技”之分相关的是“道”“器”之别,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便表明了这一点,其中的“器”主要指具体的器物,属经验的、知识领域的对象,“道”则跨越特定的经验之域,对道的追问相应地也不同于知识性、器物性的探求,作为指向形上之域的思与辨,它在实质上与智慧对世界的理解属同一序列。至中国古典哲学终结时期,哲学家进一步区分器物之学或专门之学与“性道之学”,在龚自珍那里便可看到这一点。器物之学或专门之学以分门别类的方式把握对象,“性道之学”则关注宇宙人生的普遍原理。在器物之学与性道之学的分别之后,是知识与智慧的分野。以上事实表明,中国哲学不仅实际地通过“性与天道”的追问展开智慧之思,而且对这种不同于知识或器物之知的把握世界方式,逐渐形成了理论层面的自觉意识。

可以看到,以有别于知识、技术、器物之学的方式把握世界,构成了智慧之思的实质内容。西方的 philosophy,中国的“性道之学”,在以上方面具有内在的相通性,其共同的特点在于超越分门别类的知识、技术或器物之学,以智慧的方式把握世界。

中国哲学步入近代以后,以“性与天道”为内容的智慧之思,在社会的变迁与思想的激荡中绵延相继,并逐渐形成了不同的哲学进路。这种趋向在中国当代哲学的发展中依然得到了延续,华东师范大学哲学学科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便从一个侧面体现了这一点。华东师范大学的哲学学科建立于20世纪50年代初,她的奠基者为冯契先生。冯契先生早年(20世纪30年代)在清华大学哲学系学习,师从金岳霖先生。20世纪30年代的清华大学哲学系以注重理论思考和逻辑分析见长,并由此在中国现代哲学独树一帜,金岳霖先生是这一哲学进路的重要代表。他的《逻辑》体现了当时中国哲学界对现代逻辑的把握,与之相联系的是其严密的逻辑分析方法;他的《论道》展示了对“性道之学”的现代思考,其中包含着对形上智慧的思与辨;他的《知识论》注重知识的分析性考察,但又限于分析哲学的形式化进路,而是以认识论与本体论的融合为其特点。金岳霖先生在哲学领域的以上探索,可以视为以智慧为指向的“性道之学”在现代的展开,这种探索在冯契先生

那里获得了承继和进一步的发展。与金岳霖先生一样,冯契先生毕生从事的,是智慧之思。在半个多世纪的思想跋涉中,冯契先生既历经了西方的智慧之路,又沉潜于中国的智慧长河,而对人类认识史的这种楔入与反省,又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洗礼及时代问题的关注。从早年的《智慧》到晚年的《智慧说三篇》,冯契先生以始于智慧又终于智慧的长期沉思,既上承了金岳霖先生所代表的近代清华哲学进路,又以新的形态延续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智慧历程。

自20世纪50年代初到华东师范大学任教之后,冯契先生在创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学科的同时,也把清华的哲学风格带到了这所学校,而关注哲学史研究与哲学理论研究的交融,重视逻辑分析,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互动,则逐渐构成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学科的独特学术传统。半个多世纪以来,华东师范大学的哲学学科经历了从初建到发展的过程,其间薪火相传,学人代出,学术传统绵绵相续,为海内外学界所瞩目。以智慧为指向,华东师范大学的哲学学科同时具有开放性:在上承自身传统的同时,她也在学术研究方面鼓励富有个性的创造性探究,并为来自不同学术传统的学人提供充分的发展空间。这里体现的是哲学传统中的一本而分殊:“一本”,表现为追寻智慧过程中前后相承的内在学术脉络,“分殊”,则展示了多样化的学术个性。事实上,智慧之思本身总是同时展开为对智慧的个性化探索。

作为哲学丛书,“智慧的探索丛书”收入了华东师范大学哲学学科几代学人的哲学论著,其中既有学科创始人的奠基性文本,也有年轻后人的探索之作,它在显现华东师范大学哲学学科发展历程的同时,也展示了几代学人的智慧之思。在冯契先生100周年诞辰到来之际,这一丛书的出版,无疑有其独特的意义:它不仅仅表现为对华东师范大学哲学传统的回顾和总结,而且更预示着这一传统未来发展的走向。从更广的视域看,华东师范大学哲学学科的衍化,同时又以当代中国哲学的演变为背景,在此意义上,“智慧的探索丛书”也从一个方面折射了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过程。

2014年11月28日

序*

杨国荣

《形上的智慧如何可能——中国现代哲学的沉思》一书原系郁振华博士的博士学位论文,在通讯评议及答辩的过程中,有关的专家给予了积极的评价;部分章节在有关的学术刊物发表后,也受到了一定的关注。论文通过答辩以后,作者又费时一年,进行修订。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已是一部数易其稿的学术著作。

郁振华博士原来由冯契先生指导,入学不久,冯先生不幸辞世,以后,便由我继任他的导师。作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的学生,郁振华也很自然地受到了这个系的学术传统的影响。华东师范大学哲学专业的历史虽然不很长,但其传统却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清华大学。清华大学的哲学系在三四十年代汇聚了金岳霖、冯友兰、张申府等哲学家,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新实在论的影响,并十分注重逻辑分析。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金岳霖。金岳霖对分析哲学的理论及哲学方法(包括现代数理逻辑)都有相当的研究,当时有中国的摩尔(G. E. Moore)之称;其《论道》、《逻辑》、《知识论》都可以看作是现代中国哲学史中的经典之作。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的奠基者冯契先生 20 世纪 30 年代时便师从金岳霖,自 20 世纪 50 年代初到华

* 这是杨国荣教授为拙作第一版所作的序。

东师范大学任教之后,冯契先生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洗礼的同时,也把清华的传统带到了这所学校,而注重理论研究、逻辑分析的哲学取向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结合,逐渐构成了华东师范大学哲学专业的特点。作为导师,我亦一再希望郁振华能朝以上的学术方向发展,而从郁振华的这部著作中,可以看到他确实也在努力上承以往的学术传统。

本书以中国现代哲学对形上智慧的追问和求索为主题,对中国现代哲学关于形而上学问题的理论发展过程作了深入而清晰的梳理,并展示了其中的内在逻辑脉络。具体而言,该书具有如下特点:首先是体现了哲学与哲学史的统一。该书的讨论对象虽然是中国现代哲学史,但作者并未停留于就史论史的层面,而是注重从哲学的元理论上,对哲学史的具体问题加以考察;而理论本身的形成,又基于对哲学史的总结。从理论的层面反观哲学的历史,同时也使史的考察为哲学的重建提供了资源和背景。同时,作者具有明确的问题意识。从形式的层面看,这是一部以问题为主线的著作,作者以形上智慧的探索为考察对象,分析了近代哲学提出问题的背景、问题的实质、解决问题的不同思路、各自正面的理论建树与负面的教训,这种考察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泛泛而谈。此外,本书还体现了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视野。中国近代哲学不同于中国古典哲学的重要之点,在于它以近代中西哲学的交融为背景,作者充分注意到了这一特点,既深入地揭示中国近代形上智慧的传统根据,又具体地分析它在西方哲学影响下的变迁,并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阐释了近代哲学在智慧探索上的独创之点。总之,作者对中国近现代哲学史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作了具有新意的考察。作为导师,我对郁振华在本书中表现出来的探索精神和研究能力,感到满意;而他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也使我甚为欣慰。我认为,本书的意义不仅在于提供了对近现代哲学史中某个问题的阐释,而且更在于展示了作者在哲学领域中进行创造性思考的极大潜力。

哲学自其诞生之日起便以智慧的追寻为其题中应有之义。从古希腊和先秦开始,对智慧的探求便绵绵相续。较之知识主要指向经验领域的某一方面或层面,智慧所追问的是,作为整体的存在——天与人统一的具体世界;在这里,对象的认知与存在的关切是相互关联的。智慧固然没有科学定

律等形式对经验对象加以断定,但它却规范着对存在的认知和作用,并不断引导人们扬弃被定律、命题等所分解的世界。仅仅以狭隘的知识论立场为进路,往往容易导向智慧的遗忘,在近代以来对工具理性与科学认知的片面强化中,我们确实可以看到某种遗忘智慧的趋向。马利坦曾将这种现象的产生与笛卡尔联系起来,认为:“笛卡尔废黜了智慧。”这种评论是否确当或可讨论,但自笛卡尔等把世界数学化以后,人们开始逐渐地疏远了智慧,这似乎确是一种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在尔后的实证主义那里,智慧的遗忘往往取得了拒斥形而上学的形式,它在将存在片面化的同时,也使哲学变得贫乏了。

如何克服智慧的遗忘?这是走向现代的过程中难以回避的问题。就中国近代而言,具有不同哲学倾向的哲学家从彼此相异的立场出发,往往以各自的方式表现了对形上之域的关切;这种关切同时亦蕴含了回归智慧的趋向。在追寻智慧的哲学之思中,既有天道与人道、存在与境界、自在之物与为我之物、知识与智慧、可说与不可说等等相互统一、彼此沟通的进路,也有离开人自身的存在去构造世界图景与宇宙模式的抽象思辩,正是在不同观点、思路的激荡、论争中,中国近代哲学在回归智慧的过程中不断走向具体真理。

如我以前曾提到的,作为智慧探索的内在向度,对存在的终极追问可以有两种进路:其一,本体论、认识论与逻辑学的结合,亦即在广义的认识过程中把握存在的意蕴,从康德、黑格尔到马克思,都已在不同层面上展示了这一思路,而其内在的理念则是存在(或本体)与方法的统一;其二,本体论、伦理学与价值论的结合,亦即在人自身存在意义的追求与实现中,来不断敞开存在,而它所指向的则是存在与境界的统一,这一理路较为典型地体现于中国哲学。存在与“在”的双重追寻,总是不断地将人引向新的境界。境界既蕴含了对存在的理解,又凝结着人对自身生存价值的确认,并寄托着人的“在”世理想。与存在与“在”的探寻相联系,境界无疑表现了对世界与人自身的一种精神的把握,但这种把握并不仅仅以思辩地言说为其形式,它更多地以实践精神的方式展开。境界既展示了人所达到和理解的世界图景,又与人自身的“在”融合为一。当然,以上两重路向尽管侧重不同,但并非彼此

悬隔,在求真、向善、趋美的过程中,本体与方法、存在与境界、知识与智慧统一于对性与天道的终极关切中。

当然,智慧的“形上”之思本身并非隔绝于“形下”之域。中国古典哲学很早就形成了日用即道的传统,从存在的本来形态看,日用即道意味着终极意义上的道并非疏离于日常的经验世界;就把握存在的方式而言,日用即道则意味着存在本身唯有在人的“在”世过程中才向人敞开。从最一般的意义上看,走向道的过程,可以同时看作是回归这个过程的过程。所谓“这个世界”,与维特根斯坦所说的“那样存在”的世界有所不同。维特根斯坦曾说:“神秘的不是世界如何存在,而是它那样存在。”如何存在,属具体的经验领域的问题,那样存在,则超越了经验之域。经验的探索以世界已经那样存在为前提,后者不是经验而又先于经验;人存在于其间的这个世界,则不同于本然意义上“那样存在”的世界,它并非先于经验,而是展开于社会生活的实践过程。就“这个世界”与人的关系而言,它既涉及从自在之物到为我之物的转化,又构成了人存在的本体论前提:人总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之中。

作为人内在于其间的存在形态,这个世界无疑关联着事实界。所谓事实界,首先相对于自在之物而言。如前所述,这个世界并不是“那样存在”的世界,它既非先于经验,也非本来如此,其形成过程离不开化自在之物为为我之物的过程。正如事实界是进入人的知行之域的存在一样,这个世界也已超越了本然的形态,而表现为现实的存在。除了以现实的、具体的事实形态而存在外,这个世界亦体现着一定的价值追求,并包含着文化精神、社会秩序等向度,作为人化过程的产物,这个世界总是以某种方式实现着价值的理想。它的多重样式,往往折射着多重的价值理想。总之,这个世界既呈现为事实界,又表现为价值理想的具体化,其特点在于事实界与价值界的统一。

在中国近现代智慧探索的历程中,我们固然可以看到某些偏向,但其中同时也存在着本体与方法、存在与境界之间相互统一的趋向,以及形上与形下、知识与智慧、事实与价值之间彼此互动的进路。这一智慧的历程并没有随着现代哲学史的终结而终结:它在今天依然得到了延续。事实上,哲学之

思总是伴随着对存在的无尽追问,智慧的探索也很难规定一个终点;中国近现代哲学的历程,在历史与逻辑上都构成了世纪之交哲学重建的先导,而对近现代智慧探索历程的批判反省,无疑将为今天的哲学沉思提供一个更高的理论起点。从这一角度看,我想,郁振华博士的这部著作在史与思方面,都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1999年8月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上海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上海师范大学档案馆、上海师范大学档案馆

上海师范大学档案馆、上海师范大学档案馆、上海师范大学档案馆、上海师范大学档案馆、上海师范大学档案馆

上海师范大学档案馆

第二版自序

拙作《形上的智慧如何可能——中国现代哲学的沉思》(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至今已十多年了。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使我有再版此书的机会。对于第一版的文本,我没有实质性的改动,只是作了些文字上的修订。为简洁起见,新版书名改为《形上智慧如何可能》。第二版新增的内容是二个附录。关于这二个附录,我略作说明如下。

附录一。拙作第一版总结了现代中国哲学关于形上智慧之可能性话语多方面的理论成就,同时也指出了其不足,但从总体上说,后一方面的工作还有待加强。因此,在《中国现代形上学之批判》一文中,我集中探讨了现代中国哲学关于形上智慧之可能性话语的批判超越问题。对于第一版而言,这是一个重要补充。为使此文的宗旨更为显豁,我另拟了标题“知识经验和形上智慧:二分的还是连续的”,把原标题“中国现代形上学之批判”列为副标题,并为每一节都加上了小标题。

附录二。2012年5月,“纪念‘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召开55周年”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召开,我在会上宣读了论文《1957年中国哲学史讨论会上的冯友兰和贺麟》。冯友兰先生和贺麟先生在1957年中国哲学史座谈会上的言论,与他们在1949年前的思想一脉相承,与拙作的主题也高度相关。所以,我把此文列为附录二。

拙作第二版被列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智慧的探索”丛书,感谢刘广汉先生玉成此事,感谢责任编辑肖莉女士为此书出版所做的大量工作。

2014年9月于沪上

宋日雄 序

宋日雄先生是近年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界的一位重要人物。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学者,更是一位具有深厚人文素养和敏锐思想洞察力的思想家。他的学术生涯始终贯穿着对中西文化、哲学、宗教、政治、经济、社会等问题的深入思考。他的著作《形上智慧如何可能》,正是他多年思考的结晶,也是他学术思想的集中体现。这部著作的出版,对于推动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界的深入思考,对于促进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形上智慧如何可能》一书,从形而上学的角度出发,探讨了智慧的可能性问题。作者认为,智慧并非一种简单的知识积累,而是一种对宇宙、人生、社会的深刻洞察和超越。这种智慧,需要通过哲学的思考、宗教的修行、艺术的创造等多种途径来实现。作者通过对中西哲学、宗教、艺术等领域的深入分析,揭示了智慧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表现形式和追求路径。他提出,智慧是一种超越性的存在,它不受时空的限制,也不受物质条件的束缚。它是一种对终极真理的探索,是一种对生命意义的追问。这种智慧,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的动力源泉。

宋日雄先生的学术成就和思想贡献,已经得到了学术界和思想界的广泛认可。他的著作《形上智慧如何可能》,更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这部著作的出版,不仅为学术界和思想界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也为广大读者提供了深刻的思想启迪。我们相信,这部著作的出版,必将对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界产生深远的影响,也将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

宋日雄先生,一位真正的思想者,一位真正的智者。他的著作《形上智慧如何可能》,是一部值得每一位读者去阅读、去思考、去感悟的佳作。愿这部著作能够启迪更多人的心灵,引领更多人走向智慧的高峰。

目 录

导论 / 1

第一章 科学和哲学 / 9

第一节 科玄之争:问题的凸现 / 10

第二节 知识和智慧:几种典型进路及其他 / 21

第二章 存在和天道 / 70

第一节 理气之辩的重光 / 72

第二节 精神之维的高扬 / 94

第三节 走向心物之辩的合理解决 / 123

第三章 直觉和理智 / 145

第一节 逻辑分析法及其限度 / 146

第二节 理性的直觉 / 158

第三节 逻辑思维的辩证法 / 180

第四节 余论 / 193